

冷戰及兩個中國： 1950-1960年代韓國對「中國」 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

李奉範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教授

林筱慈 譯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中文摘要

冷戰時期結束後，與台灣斷交（1992年8月23日），進而與中國建交（1992年8月24日）等外交關係上的變化對於韓國的中國認知有極重大的影響。此時期，韓國對於中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開始蓬勃發展，涵蓋了中共與台灣文學作品的「中國文學」得以恢復原貌。然而，早在這之前，韓國對於中國的認知與翻譯中國文學的歷史是相當曲折的。一直以來韓國學界大多以「台灣（接受）／中共（排除）」的二元框架來說明，冷戰期間韓國對「中國」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然而，從當時韓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思想的關心程度，可以證明所謂的二元框架——「台灣（接受）／中共（排除）」並不足以說明其中存在的許多複雜層面。

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對於台灣與中共的接觸與理解基本上都是在「冷戰亞洲」的框架下進行的。在這樣的框架下，韓國與台灣對中國的認知其實與其各自對東亞各國，特別是對日本看法與理解相關。從大脈絡來看的話，其實是因為美國的亞太地區統合戰略造成韓國對中國的認知與理解畸形化。同時期，韓國大多是藉由美國的研究與評論、情報等來量產有關中共的種種談論。其中，大多是將焦點放在揭露中共的暴政等與事實不符的觀察。然而，六〇年代以後，韓國對中國的理解開始有所轉變。516 軍事政變後，朴正熙政權在「重視亞洲」的冷戰外交策略的後援之下，推動了所謂的「知己知彼的中共研究」。然而，在這之中，其實暗藏了韓、美之間的利益糾葛以及韓國引進美國現代化理論等學術問題。此時期，韓國對於台灣的定義維持「自由友邦」的基調，只是對於台灣的關心轉往經濟層面，將焦點集中在台灣的現代化問題上。

因為嚴苛的查禁制度以及韓國大學教育的衰微，相較於其他外國文學，五〇到六〇年代的中國文學的翻譯樣貌相當的畸形化。在韓國出版的兩百本世界文學全集之中只有四本中國文學，而這四本中國文學收錄的不是前近代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就是台灣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說，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雖然逐年增加對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但所謂的「中國文學」卻只局限於前近代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台灣的戰後文學等當時屬於台灣、中共文壇的邊緣文學。

關鍵詞：冷戰、台灣、共產中國、冷戰對外政策、APACL（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PAC（亞太協議會）、藝術團、檢閱、中國文學史

Cold War, Two Chinas, and acceptance of China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50s and 60s Korea

Lee, Bong-Beom

Visiting Professor,

Academy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Translator:

Lin, Xiao-Ci

Ph.D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Korean government brok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These actions transformed Koreans' attitude toward China fundamentally. Behind these turn, there is a difficult history of accept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ld War Korea. It is a good example that the acceptance of Cao Yu's "Thunderstorm" in Cold War Korea. Korean approaches to china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ld War period

can't be just characterized by a binary structure: selecting Taiwan and excluding Communist China. As Korean intellectuals' continued interest in Mao Zedong shows, what is officially considered excluded had promoted another way to understand China. In 1950s and 60s Korea, relationship with two Chinas was promoted or, conversely, limited by Korean governments' Cold War controls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It was foundations of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APACL) in 1954 and 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 (ASPAC) in 1966 that materialized Korean governments' Korean-led Asian regional initiative. Though these organizations couldn't be military alliance such as NATO because it would conflict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ies, it promoted paradoxically Kore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s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1950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were mostly taken in form of goodwill missions' Southeast Asia tour held by APACL, these tours are nothing but a ideological solidarity based on Anti-communism and dictatorship. Korean journalism's discussions on Communist China also followed Cold War antagonism because their sources was very limited and depended on American materials. However, It began a new phase of Korean approach to China in the 1960s. As détente mood has arrived and Park's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implement a more Asia-conscious foreign policies, it improved that studies of Commu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Asia, especially Communist China. While American private foundations including Ford and Asia Foundations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ld war networks, it became to broaden transnationally that area of study on Communist China. Koreans' main interest about Taiwan was shifted from cultural issues to economic issues, focusing issues of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These changes on way to understand Two Chinas also work translating and accept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very little Chinese works in world literature anthologies in the late 1950s, and it were just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or Taiwanese writers' works in them. Koreans didn't think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significant for world literature a whole. However, Chinese literature is second only to Anglo-American works in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most of them include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wuxia* fictions, and some of Taiwanese post-war literature. Many of those translations are the excluded works in both Communist China and Taiwan. In 1950s and 60s, Korean translations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were generally controlled by Cold War censorship, as well as its lack of academical and journalistic infrastructures: related department in high education system, scholarly societies, and academic journals. In 1960s, Lin Yutang's and Lu Xun's works were accepted a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which support Cold War Anti-communism. Besides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inevitably translated and got acceptance in Cold War context, a series of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steadily published. These works have merits as systemic approach, but generally give Taiwanese literature legitimacy as a successor to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t also shows that the boundaries of Korean understanding Two Chinas was limited by Cold War.

Key words: Cold War, Taiwan, Red China,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APACL (Asian Peoples Anti Communist League), ASPAC(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 art delegation, censorship, history of China literature

冷戰及兩個中國： 1950-1960 年代韓國對「中國」 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

一、冷戰與中國文學

1989年12月馬爾他高峰會結束後，冷戰時期隨之宣告結束。此後，隨著韓國與台灣斷交、與中建交等「一個中國」為基調的政治外交政策上的改變，韓國對中國文學（化）的認知態度也有所變化¹。為了更加正確地了解中國文學的樣貌，韓國開始翻譯、介紹大量的中國現代文學。並且開始反省先前因為南北韓分裂狀態下，造成意識型態對立，進而造成韓國在翻譯中國文學時大多著重在古典文學作品的局限性。此外，冷戰期間韓國大學的中文系所與相關學界的保守態度而所造成在中國文學認知上的扭曲，都開始有所改變。即，九〇年代以後，韓國對於中國文學理解也展開了新的篇章²。1988年，在盧泰愚總統的〈7月7日特別宣言（以民族的自尊：南北韓的統一與繁榮）〉之後，韓國開始推動與中共、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外交政策。過去被韓國社

¹ 這篇文章裡以「台灣」來指稱自由中國、中華民國，並以「中共」來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指稱分裂以前的中國以及統稱台灣與中共的時候則用「中國」表示之。這是考量到各名詞背後所具有的歷史性。1992年8月韓國與中共建交之前，稱呼兩個中國時所該用的詞語是中共、台灣與韓國之間外交上敏感的問題。在1988年首爾奧運舉辦之前，韓國社會已普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而稱自由中國、中華民國為台灣。面對韓國的稱呼變化，台灣當局曾就此持續提出抗議，認為這樣的稱呼破壞了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不著撰者，〈台灣抗議韓國的「中國」稱呼〉，《東亞日報》，1988年7月17日，頁6。

² 不著撰者，〈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活躍介紹〉，《韓民族日報》，1991年5月3日，頁9。

會視為禁書的社會主義相關書籍，如文學、歷史、哲學等開始得以翻譯、出版³。1987年10月19日韓國通過〈促進出版措施〉的相關法案，於是過去被歸類於禁書、禁售的431種書籍也得以開始流通⁴。其中，中國現代文學的傳入與翻譯、研究有很大的進展。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中國現代文學全集》⁵。儘管在〈國家安全法〉的管制下，讚揚、宣傳共產主義體制等相關內容仍然被禁，但是此時已正式展開有關中國文學的出版與研究。

然而，隨著八〇年代後期，國際局勢進入後冷戰時期，文學的變化也因應而生。有別於政治外交、國際貿易皆以中共為優先考量的對象，這時候的韓國反而對於「中國文學」有更全面的掌握。首先，《中國現代文學全集》是韓國文壇系統化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最早成果。中國新文學的先驅——魯迅以及老舍、趙樹理、蕭軍的革命文學，再到周克芹、湛容等批判、揭露文化大革命真相的傷痕文學的七〇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皆收錄在此書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八〇年代末的韓國，中共的近現代文學已是可以合法翻譯、市售的書籍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本《中國現代文學全集》裡也收錄了部分的台灣文學作品，開啟了韓國綜觀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可能性。有別於五〇到七〇年代只能在大學教材或是特定的中國文學選集才可以看到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作品，冷戰結束以後，就連一般社會大眾也都可以廣泛地接觸到魯迅的作品。此外，戴厚英的傷痕文學、張賢亮與王朔的通俗文學等以及中國文學史、相關研究史也都陸續出版。從當時韓國國內的流行語：「大陸文學的登陸」即可以知道冷戰結束以後，中國文學在韓國所掀起的熱潮。這也說明了韓國不再需要透過台灣來接觸中共文學，也不需要以美國為媒介來接近中國（台灣）文學⁶。於是，從此時期開始有關於中國革命史等內容的書籍也都陸續出版。

³ 不著撰者，〈銳不可擋的中蘇相關書籍〉，《京鄉新聞》，1988年10月29日，頁11。

⁴ 在這法案通過之前越北作家的作品（20本）、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品（18本）：巴金、魯迅、茅盾、老舍、艾青、張學良等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就占了16個類別。許世旭的《中國現代詩選》也包含其中。以上這38類別作品跟進入司法審判的181個類別的作品，大多在〈7·7特別宣言〉之後，陸續出版上市。

⁵ 中央日報社編輯群，《中國現代文學全集》全20卷（首爾：中央日報社，1989年）。

⁶ 王康寧，〈韓國對於張愛玲文學的介紹與翻譯內容〉（首爾：高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頁86-89。

另外，冷戰體制結束以後，韓國國內的台灣文學的引進也有了新的局面。冷戰時期，韓國與台灣雖為友好關係，但是對於台灣文學的介紹卻只局限在像王藍的《藍與黑》這樣的反共文學、瓊瑤等的大眾文學以及謝冰瑩、林海音等部分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台灣的武俠小說。然而，即使存在著「台灣（接受）／中共（排除）」的基本原則，但韓國文壇並未因此而大規模地翻譯、介紹台灣文學。也就是說，即使在冷戰期間，韓國與台灣進行許多的文化交流，但並未因此大量地介紹台灣文學。韓國反而主要以台灣為管道，透過台灣間接地接觸中國文學。直到台韓斷交以後，韓國才真正地認識、介紹台灣文學。台韓斷交以後，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對台灣有所封鎖，但是卻也擺脫韓戰以後必須透過美國來接近台灣的束縛。韓國可以直接與台灣接觸，進而與台灣進行文化運動上的交流。九〇年代以後、進入所謂的後冷戰時期，隨著東亞論的興起，韓國學界認知到脫離西歐文化中心論以及客觀了解中共等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性，於是開始修正冷戰時期對中共、台灣文學的認知態度⁷。

然而，早在這之前，韓國對於中國文學的翻譯過程是相當曲折的。中國現代戲劇的始祖——曹禺及其作品《雷雨》在韓國的翻譯與公演恰恰演了這段曲折的歷史。《雷雨》在 1946 年 5 月由金光洲翻譯、善文社出版上市。隨著文字書籍的翻譯出版，「樂浪劇會」與李曙導演於 1946 年 7 月策辦了《雷雨》在韓國的初次公演。1950 年 6 月，韓國國立劇團第二次定期公演時再次將《雷雨》搬上舞台，15 天之內累積了 7 萬以上的觀看人次，盛況空前⁸。然而，在此之後，一直到 1988 年解禁之前，《雷雨》在韓國的公演都是被禁止的。原因在於曹禺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家。有趣的是，《雷雨》被禁的原因除了因為它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品之外，也與《雷雨》的作者有時候被認為是魯迅有關。韓戰以後，由於《雷雨》被誤認為魯迅的作品，由此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命中注定的女人》，在查禁的過程裡，有 260 個畫面（約電影的一半以上）被刪除⁹。

⁷ 白永瑞，〈對我們而說台灣是什麼？〉，《看待台灣的視角》（首爾：創批，2012 年），頁 23-31；尹汝一，〈東亞論：1990-2000 年代韓國思想界的一面〉，（首爾：Dolbegae，2016 年），頁 128-133。

⁸ 不著撰者，〈1955 年的劇界〉，《東亞日報》，1955 年 12 月 29 日，頁 4。

⁹ 金元洲導演，《命中注定的女人》（首爾：聲寶電影公司，1957 年）。

而因為《雷雨》被誤認是魯迅的作品，連帶著直到六〇年代《命中注定的女人》都是被禁的¹⁰。此外，光復以後，北韓曾經推動《雷雨》的公演，然而，之後卻因為認為該作品並不具進步性的理由而被禁演¹¹。考量到這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知道，直到八〇年代後半，韓國對《雷雨》的翻譯與介紹的可否都與其作者的身分息息相關。《雷雨》的作者如果被誤認是魯迅的作品的話就可能被韓國社會禁止或是許可出版。由此可知，韓國對《雷雨》的翻譯與介紹其實都反映出錯綜複雜的冷戰文化史。此外，如崔珍豪的研究所示，韓國對於魯迅（文學）的介紹就大脈絡來看也與冷戰時期韓國的中國認知有關¹²。

就韓國翻譯、介紹曹禺《雷雨》的情況，我們可以知道冷戰期間，韓國對於「中國」的認知以及對於中國文化的翻譯與介紹是難以只用「台灣（接受）／中共（排斥）」的二元框架來說明。其中存在許多的複雜層面。即，所謂「被排除」的邊緣性存在其實在某些脈絡裡是有其影響力，並且為韓國的中國認識開拓新的局面。舉例來說，當時韓國知識分子對屬於被排除範圍的金相浹的《毛澤東思想》¹³就有一定程度的關心。由於意識型態的對立，六〇年代對於中共的研究在韓國國內的學界是不被允許的，或者是處於相當萎縮的狀態。因此，金相浹的《毛澤東思想》的出版是相當例外的存在。五〇年代韓國對於毛澤東的定位是「全亞洲的共同敵人」、「世紀暴君」、「我們民族的仇人」、「亞洲人的共同敵人——毛澤東」¹⁴。然而，六〇年代隨著中共出版的《毛澤東全集》（全四卷），日本與歐美學界開始正式地研究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也在韓國國內引起很大的風潮。1968年《毛澤東思想》的再版、改版、1976年《毛澤東思想》的增訂版等書的出版，不斷地促進韓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的研究¹⁵。由於此書收錄的內容齊全、論述客觀，在當時被視為具有學術價值的專書¹⁶。《東

¹⁰ 田淑禧，〈短評：命中注定的女人〉，《京鄉新聞》，1957年7月17日，頁4。

¹¹ 金光州，〈爐邊隨筆：「新」的〉，《東亞日報》，1947年1月7日，頁4。

¹² 相關研究請參考崔珍豪的博士論文。崔珍豪，〈韓國的魯迅介紹與現代中國的想像〉（首爾：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¹³ 金相浹，《毛澤東思想》（首爾：知文閣，1964年）。

¹⁴ 金一平，〈蔣介石與毛澤東〉，《新太陽》，1958年11月，頁65。

¹⁵ 有關毛澤東的研究著作有吳炳憲的《毛澤東思想》。這本書在1976年司法機構被認定為是通敵書籍。吳炳憲，《毛澤東思想》（首爾：白松文化，1975年）。

¹⁶ 安炳煜，〈我所讀的新書：金相浹的《毛澤東思想》〉，《京鄉日報》，1964年5月25日，

亞日報（1964年5月25日）》也認為有必要熟讀此書以了解中國共產主義的實像。當然隨著「知己知彼勝共」的強調，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思想比較也受到重視。韓國對於蔣介石的介紹也隨之而生。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¹⁷在韓國翻譯成冊¹⁸。由於此書記錄了自由中國（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反共抗俄策略，在韓國被視為研究滅共戰略時的必讀書¹⁹。翻譯本、報刊連載與單行本主要是以純韓文來翻譯蔣介石的著作，所以就教育民眾反共鬥爭的重要性以及向民眾宣傳韓國與台灣聯合反共的必要性與意義等工作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類的書籍有《中國的命運》²⁰、《蔣介石傳記》²¹、《蔣介石秘錄》²²等。即，隨著冷戰秩序的變化，特別是1962-1966年的中蘇紛爭而引起的共產勢力分裂、中美之間緊張關係的趨緩、源自美國的現代化理論等因素都影響著冷戰亞洲對中國的認知。

然而，在六〇年代，韓國對於毛澤東以及中國的翻譯、研究意味著冷戰時期對反共主義以及中共認知的轉變。特別是由於1962-1966年中蘇衝突以後，美國開始對中共採取溫和的外交政策，冷戰體制趨於緩和。美國的公共政策從敵對、孤立中共，轉向基於與中共妥協、合作的共存政策（1963年11月）。此外，美國積極接受沃爾特羅斯托夫（Walt·Whitman·Rostow）的現代化理論，開始從現代化的角度檢視冷戰亞洲的新秩序。即，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韓國知識界對中共的認知也逐漸發生變化。也就說，雖然當時中共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讓韓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共的看法趨於保守，強化了反共的情緒，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夫的現代化理論仍然改變了韓國知識分子對中共的看法²³。這種變化

頁5。

¹⁷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台北：中央文物，1956年）。

¹⁸ 蔣介石著，中國學會譯，《中國裡的蘇聯：暴露中共奪取大陸的真相》（首爾：隆學社，1958年）。

¹⁹ 俞鎮午，〈歷歷在目的歷史教訓〉，《東亞日報》，1958年10月26日，頁12。早在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翻譯、出版之前，《首爾日報》就曾以〈中國內部的蘇聯〉為題，抄譯、連載過相關的內容。

²⁰ 宋志英譯述，《中國的命運》（首爾：首爾時代出版局，1946年）。

²¹ 尹永春譯述，《蔣介石傳記》（首爾：翰林社，1971年）。

²² 柳根周編譯，《蔣介石秘錄》全五卷（首爾：育文社，1976年）。

²³ 鄭文祥，〈「中共」與「中國」之間——由1950-1970年代大眾媒體的對中論述，了解韓國人的中國觀〉，《東北亞歷史論叢》第33號（2011年9月），頁57-90。

也反映在韓國對台灣的認知態度上。在冷戰時期亞洲的地緣政治框架中，台灣與韓國是在反共的前提下，強調彼此間的團結，並且仍是以外省人的角度來看待台灣。然而，在六〇年代以後，韓國對於台灣的關心逐漸轉向關注經濟層面。韓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不再停留在過去政治和意識型態方面的結盟，反而轉於關注台灣的各種現代化發展²⁴。韓國不是以政治軍事和安全因素去關注台灣的存在，而是將台灣放在東（南）亞的框架下，思考彼此在文化交流的可能。

如上述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冷戰期間，韓國對於中國的認知與中國文化的翻譯難以只用「台灣（接受）／中共（排除）」的二元框架來說明。其中存在許多的複雜層面。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即所謂的「兩個中國」的劃分、中共於韓國戰爭出兵、東亞的冷戰秩序裡的反共聯盟強化都導致對中共的認知被排除在外。然而，隨著消滅臨敵、東亞反共聯盟的合作的冷戰體制約束力、亞洲停滯性、落後性的克服與現代化的追求、美國的東亞戰略等要求下，韓國等國家皆持續地關注中共的情況。正因如此，也許比起有關台灣的論述，對中共的談論占有更多的優勢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執著於反共聯盟的框架下，韓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反而更顯得有些偏頗、只是表面的接近²⁵。如同韓國稱台灣為自由中國一般，韓國對於台灣的認知其實主要是局限在反共友邦國的概念，也許台灣作為唯一代表中國正統性、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也只是一種想像的口號而已。

二、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的冷戰外交策略與對中認知的新紀元

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對於台灣、中共的理解與接近基本都是在冷戰亞洲的框架下進行的。在無法與中共直接接觸的情況下，韓國只能透過美國、香港、日本與台灣等媒介來接近中共。因此，韓國對於中共的認知是單一化的。基本

²⁴ 鄭文祥，〈冷戰時期韓國人的台灣觀——以日刊雜誌的台灣相關報導為例〉，《中國現代史研究》第58期（2013年6月），頁93-96。

²⁵ 文明基，〈韓國的台灣史研究：1945-2012〉，《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7期（2013年3月），頁238-244。

上對韓國來說，中共並不是一個國家而只不過是蘇聯的魁儡而已。韓國對於台灣與中共的接觸與理解基本上都是在「冷戰亞洲」的框架下進行的。在這樣的框架下，對中國的認知其實與台灣跟韓國各自對東亞各國，特別是對日本看法與理解相關。從大脈絡來看的話，由於美國的亞太地區統合戰略，造成韓國對中國的認知與理解有所扭曲。同樣地，韓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發展也只能受限於冷戰的框架。

韓國戰爭往往被認為是冷戰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韓戰不僅使美蘇正式相互對立、競爭，也對戰後東亞各地區的秩序重整有所影響。舉例來說，美中對立激烈化、日本的戰後重建（經濟復興）、台灣的戰略地位強化、東南亞國家的內部統合、強化民族國家的建設等。特別是，韓戰為生產錫、天然橡膠等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帶來了正負面的影響，連帶地也影響了日後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方向²⁶。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亞洲逐漸成為冷戰體制的核心部分，亞洲各地區也因為複雜多變的冷戰秩序而變得更加緊密。因為這樣的世界情勢變化，韓國確立了「自由陣營的最前線」的名分，當這樣的名分論與追求實際利益論相結合、韓國政權與社會全體的思考方式皆以冷戰為主。也就是說，冷戰情緒主宰了韓國內外。在這樣的氛圍之下，1954年李承晚主導的「亞洲民族反共聯盟（APACL）」與1966年朴正熙主導的「亞洲太平洋理事會（ASPAC: 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接連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機構不僅在外交層面上，也在韓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這些機構也左右了韓國對亞洲的理解情況。冷戰期間，代表了韓國的「亞洲地區主義外交」的上述兩個機構具有共同的目標。兩者皆以東亞反共同盟體（集團防衛體制）為基本目標，此外，這兩個機構也強化與美國的合作以牽制日本為主的論調，將韓國放在區域統合的中心位置上。在文化方面則是以民間交流為主，與反共國家間的交流逐漸活躍。APACL 韓國分部到1959年為止，總共舉辦了五次 APACL 大會。為了與其他 APACL 會員國（台灣、香港、菲律賓、南越、泰國、寮國）有更多的交流，在多次的官方與民間的合作下，多次派遣東南亞文

²⁶ 今川瑛一著，李鴻培譯，《東南亞現代史與世界列強的資本主義擴張（下篇）》（首爾：異彩，2001年）。

化使節團。韓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學術交流也屬於此文化使節團活動的一環。由此可知，韓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以 APACL 為管道。

韓國與台灣正式的文化交流始於台灣學者朱家驊、董作賓、溥儒的訪韓之旅（1955 年 5 月）。在「韓中文化協會」的促進下，「震檀學會」邀請的台灣學者訪韓之旅，在報紙上則是以韓中反共聯盟、對共文化戰線強化的觀點報導²⁷。也就是說比起對韓中文化交流，當時韓國更加關注的是台灣文化人反共戰線的活動樣貌以及國民黨的反攻大陸政策等相關內容。由此可知，民間的文化、學術交流被認為是強化兩國反共聯盟的必要因素。韓中文化協會促進的民間交流，不只限於文化、學術交流，也漸漸擴展到體育、經濟方面的交流。而這些交流的重要目的依舊是為了兩國的反共合作。故，台灣經濟使節團的韓國視察等經濟交流因為只是民間的交流沒有正式的貿易協定，所以並沒有產生實質的效益。與台灣之間交流也透過 APACL——「東南亞藝術使節團」的方式進行。APACL 韓國分部，即韓國亞洲反共聯盟透過與其他各國的 APACL 分部連結、派遣東南亞藝術使節積極地促進各國民間的文化交流。APACL 會員之間的交流，韓國與台灣之間的藝術團派遣一直到持續到六〇年代初。1957 年 12 月臨時成行的「訪華親善團」（19 名，團長朱耀燮）等韓國文化界人士的遊記大多連載於報紙上。爾後，這些文化界人士的遊記集結成冊——《自由中國的今日——台灣紀行》於 1958 年 4 月（春潮社）出版。隨著此書的出版，台灣的形象也由此塑造而成。由於，APACL 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故其底下派遣的訪問團以及成篇的遊記皆與反共政治宣傳的內容相關²⁸。此書的結構是王東原（駐韓中國大使）的序文、張其昀（自由中國的教育部長）的〈花郎精神〉，書最後的部分則是所屬機關——「韓國亞洲反共聯盟」的吳權所寫的〈同行所感〉所組成，以此強調本書的反共意識。然而，透過實際到台灣視察，韓國文化界人士各自對於想像的台灣也有其他新的發現。諸如，台灣的土地改革的成功、經濟發展、農村建設與發展、愛用國貨、進步的教育環境與水準、秩序化與節約精

²⁷ 不著撰者，〈自由中國的三位學者訪韓與文化交流〉，《京鄉新聞》，1955 年 5 月 15 日，頁 1。

²⁸ 張世真，《悲傷的亞洲：韓國知識分子們的亞洲紀行（1945-1966）》（首爾：青史，2012 年），頁 156-175。

神等。但整體來說，即是對台灣現代化的再發現。這樣的發現也讓蔣介石成為韓國學習的榜樣以及用來迂迴批判韓國政策的基準。當然，韓國文化界人士也發現了台灣某些負面的部分。比如，日語的廣泛使用與固守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文化以及省籍衝突等問題。此外，鄭飛石嚴厲地指出台灣箝制言論的問題，並批判蔣介石政府的戒嚴體制。《自由中國的今日——台灣紀行》的基調與對台灣的再發現，即台灣作為反共友邦與近代化的形象於五〇年代初登場，爾後一直延續到六〇年代。所謂的台灣紀行並不只反映出筆者自身對台灣的認知，它也成為當時韓國社會對台灣的認知的契機。然而，這其實也代表韓國其實是透過外省人的視角來看待台灣，進而型塑台灣的形象。通過當時韓國報紙裡描述的台灣社會的負面形象之一：日本文化仍然盛行，其實也反映出韓國當時根深蒂固的抗日民族主義精神。韓國基於對日本殖民經驗的批判精神，刻意誇大了存在於戰後台灣社會的日本文化的影響力。於是，我們可以知道來台灣旅遊、訪問的韓國文學藝術家的觀點並未對台灣社會有客觀的理解。

五〇年代韓國對於「兩個中國」的關心逐漸增加。主要透過報章雜誌等來量產有關中共的談論。如同前面所強調的，在中共相關資訊都被隔絕的情況下，韓國對於中共資訊的接觸主要是透過美國的研究、評論等資訊。而韓國國內的報章雜誌的內容與專家的評論大致上著重在中共是如何因應冷戰亞洲秩序的變化，其中更是特別關注中共與台灣的兩岸問題、東南亞中立國們與中共之間的關係。雖然在這篇研究裡，難以完全地統整冷戰時期有關中共的所有內容，但是對於中共的談論大概可以歸類為「中共是破壞亞洲，甚至是世界和平秩序的主犯」的主調。因此，中共是以美國為首的亞洲反共聯盟所必須封鎖、消滅的人類公敵。在這過程裡，韓國也實際進行幾次了解中共的計畫。雖然不是很深入的理解，但相對來說，這也足說明當時韓國是如何理解中共的。諸如，〈劇變中的中國〉²⁹、〈中共的現實〉³⁰、〈中共的暴政〉³¹等相關專題報導。〈劇變中的中國〉³²在內容上主要強調的是，在美蘇之間的利害關係下，中共是難以進攻

²⁹ 不著撰者，〈劇變中的中國〉，《現代公論》，1954年12月，頁125-183。

³⁰ 不著撰者，〈中共的現實〉，《新太陽》74號，1958年11月，頁184-189。

³¹ 不著撰者，〈中共的暴政〉，《東亞日報》，1959年5月21日-6月12日，頁2。

³² 收錄了〈中共的勞工政策與勞工階級〉、〈中共的攻台可能性高嗎？〉、〈中共政權下的農

台灣的；同樣地，蔣介石政府因為同樣的原因而難以反攻大陸。此外，也強調冷戰體制與亞洲反共體制下，金門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性，故自由陣營之間必須以此地為重點加強合作與武力的升級。而在〈中共的現實〉³³則是認為依據中華思想而成的國家中心主義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強烈的中共人民很可能會排斥蘇聯式的外來思想，進而導致中共內部的分裂。為了加速中共內部的分裂，自由陣營必須採取強烈的反共態度，此外，台灣的民主建設也是必須的。〈中共的暴政〉屬於最清楚地分析五〇年代中共實際樣貌的連載刊物。就像在刊物主旨裡所說的一般：「本刊物試圖去分析西歐人眼中的『謎語』——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特性。其中包括國民性、中國共產黨、特權階級、經濟、教育、文化等中共成立十年以後的各種問題。」這本刊物之所以可以廣範圍地展示這麼多有關中共的資訊也是因為其參考了美國的研究與資訊³⁴。這份連載刊物雖然主要是在揭露中共成立十年間的暴政，但也分析中共在十年之間所推動的各種政策，其政策推動的過程及成果，詳細地呈現中共的社會文化變化。並且透過具體的統計資料的展示，增進了對中國理解的效果性³⁵。不單只是批判中共的暴政也客觀地接近中共，就這方面來看，這份連載刊物是具有一定正面的效果。

冷戰反共框架下韓國對於中共的認知在六〇年代迎來了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 516 軍事政變以後，朴正熙政府正式推動的亞洲為主的冷戰外交政策有關。即，這樣的變化與名為「ASPAC」的機構有關。ASPAC 在美國與其他參與國反對下，褪去政治、軍事（反共同盟體）等色彩，單以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為主。1966 年，基於對共產主義國家採取門戶開放的原則下，自由陣營國家開始參加於共產國家地區所舉辦的會議（非政治會議）、技術訓練團的派遣、

民們〉、〈宋美齡與宋慶齡〉、〈毛澤東的繼位者〉、〈金門 823 砲戰——兩大陣營的對峙〉等文章。

³³ 收錄了〈中共的地理位置——亞洲民族的安全保障了世界的永久和平〉、〈蘇聯、中共、北韓——支配北韓的蘇聯〉、〈中共的影響力〉、〈中國的民族性與中國問題的將來〉、〈蔣介石與毛澤東〉、〈我們不承認中共的理由〉等文章。

³⁴ 推測是參考美國刊物《New Leader》於 1959 年的企劃的「Communist China's First Decade」。

³⁵ 這樣的改變正好與〈敵！中共的實情是？〉完全相反。在這篇文章裡翻譯、收錄了 6 篇刊載在外國雜誌的周鯨文（台灣民主同盟）的文章。雖然是在知己知彼的原則下進行的刊載企劃。但是正如題目所呈現的，文章內容仍是以仇視中共為主要論調。就像編輯者所說的：「當時韓國要理解中共時，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即在於資料的收集。」。不著撰者，〈敵！中共的實情是？〉，《清晨》4 卷 10 號（1959 年 10 月），頁 133-150。

允許沒有邦交關係的會員國（北韓、東德、北越等分裂中的國家）參加國際機構舉辦的會議。在這樣的脈絡之下，韓國在所謂「知己知彼勝共論」的原則下，進行有關中共的研究。其中，高麗大學的亞洲問題研究所的中共研究與相關各大型國際研討會得以逐步進行。「亞洲的共產主義問題（1966年6月20日-25日）」研討會中，韓國學者們所發表的26篇論文，在日後集結成書——《中共圈的將來》出版、上市³⁶。這次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研發氫彈的中共局勢，同時也包含了韓國國內第一次綜合性地去研究與中共有直間接關係的北韓、越南、菲律賓、印尼、柬埔寨、印度等其他亞洲地區的共產黨。對於中共的研究熱潮也因為東柏林事件而短暫停擺過。原因在於擔心對於共產國家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仍然是危險的，故應對「知彼」做一定限度的規範。然而，由於，各界人士強烈地反對盲目地封鎖共產主義國家，故韓國對中共的研究逐漸步上軌道。韓國對中共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研究方向。就學術的層面來說，關於中共的研究書籍大量出版；另一方面，因為報章雜誌廣泛地介紹有關中共的知識與資訊，故韓國民眾也開始關注中共的相關消息。韓國對中國的研究可以更上一層樓的原因與冷戰有極大的關係。即，韓國對中國的研究其實都與韓美之間的利害關係以及起源於美國學界的現代化論的交流息息相關。此外，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與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之間的交流其實代表了以現代化論為媒介，美國—韓國—台灣的冷戰學術交流網絡。如同上面所述的一般，六〇年代韓國在「知己知彼」的脈絡裡，以亞洲的共產主義與現代化的問題為核心的中國研究更加專業化。這也反映出隨著冷戰秩序的改變、中共國際地位的上升等事實。相反地，對於與台灣之間的交流仍然以自由友邦為基調，而對台灣的關心也漸漸地轉向經濟發展，即現代化問題的層面。

三、五〇到六〇年代中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的畸形化

五〇年代韓國國家權力、出版資本與文化主體體認到自身文化的落後性，故在當時翻譯事業被認為是相當迫切的社會文化議題。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中

³⁶ 金俊燁編，《中共圈的將來》（首爾：汎文社，1967年）。

國文學第一次被賦予外國文學的資格並得以翻譯³⁷。在韓國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必須通過嚴格的審查制度。雖然，基於對共產主義國家採取門戶開放的原則，韓國對於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介紹保持開放的態度。但是，一直到 1988 年解禁之前，中國近現代文學與北韓文學在韓國都屬於不可觸碰的禁忌。思想、學術等某些領域得以持續開放但唯獨文學作品所以被查禁的狀態。就當時韓國翻譯事業的最佳成果——《世界文學全集》裡各國家的作品比例來看，中國文學的所占的比例相當低。舉例來說，東亞出版社有限公司的《世界文學作品集》的出版計畫（共 50 冊）中，並沒有中國文學。五〇年代後期以來，出版的各種戰後世界文學全、選集，如《世界戰後文學選集》一書裡，中國文學也被排除在「當代世界文學」之外³⁸。《現代世界文學全集》裡，也將中國文學排除在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舊文化出版社的《世界戰後文學全集》網羅了韓國，美國，法國，英國，南北歐和日本的詩歌、小說、戲劇等世界各國的戰後文學，然而，其中中國文學與俄羅斯文學被排除在外³⁹。《現代世界文學集》也是類似的情況。該書當中收錄了「北歐和印度篇（11 本書）」，和「日文版（12 本書）」，但中國文學依然被排除在外。同樣地，在韓國出版了一系列的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外文專書，但是依舊沒有將中國文學獨立出版成冊。當然，有關於中國近現代史或中國共產黨史的翻譯書籍也是寥寥可數。此外，收錄於世界文學全集裡為數不多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裡，不是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古典文學就是幾名台灣文學家的著作而已。諸如，《女兵自傳·紅豆·離婚》⁴⁰、《東洋的智慧》⁴¹、《剪燈新話·老殘遊記》⁴²、《中國詩歌選》⁴³（池榮在編譯，1973 年）。從想像中的「世界文學」到「戰後世界文學」，中國文學都處於邊緣位置或是等同於被排除在外。這可以說是韓國翻譯事業的一種畸形樣貌。

³⁷ 李奉範，〈1950 年代翻譯場域的生成與文學翻譯——國家權力、資本、文化構造上的相關性〉，《大東文化研究》第 79 號（2012 年 9 月），頁 433。

³⁸ 新舊文化出版社編輯群，《世界戰後文學選集》（10 卷）（首爾：新舊文化出版社，1959-1962 年）。

³⁹ 民眾書館編輯群，《現代世界文學全集》（12 卷）（首爾：民眾書館，1969 年）。

⁴⁰ 謝冰瑩著，金光洲譯，《女兵自傳·紅豆·離婚》（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 年）。

⁴¹ 孔子、孟子著，車柱環譯，《東洋的智慧》（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 年）。

⁴² 瞿佑、劉鶯著，李慶善、金時俊譯，《剪燈新話·老殘遊記》（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 年）。

⁴³ 池榮在編譯，《中國詩歌選》（首爾：乙酉文化社，1973 年）。

然而，在 815 光復後，韓國的中國文學翻譯現象卻與上述內容有大的不同。在 1945-1963 年 8 月的官方統計中，中國文學的翻譯是 138 篇，僅次於英國和美國文學 197 篇，多於法國文學的 68 篇。這樣的翻譯趨勢一直持續到七〇年代初期。事實上，此時韓國翻譯的中國文學大多屬於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此時期主要的中國翻譯作品大部分是以《三國志》為首的中國四大奇書等前近代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從《三國志》（全五卷，1960 年）開始到《金瓶梅》、《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與《列國志》等以單行本的形式重複出版。爾後，這些單行本也以全（選）集的方式再出版。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翻譯的文化、社會流通方式與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即，發展出新聞連載到單行本的發行與廣播再到全（選）集的出版系統。中共成立之後，「四類反動書籍」，也就是說具有反動性質的書籍（《六法全書》、《三民主義》、《孫文學說》等）、具有封建性質的書籍（《詩經》、《禮記》、《孫子》等）、具有迷信性質的書籍（《西遊記》、《封神榜》等）、破壞社會風俗的書籍（《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等）在韓國卻是大受歡迎⁴⁴。而這樣的情況則一直維持到九〇年代。然而，韓國對中國詩作的翻譯事業就顯得相對低迷。翻譯的類別主要是《詩經》等中國古詩歌之類的作品。只有在《現代中國詩選》（1975）以及《中國現代詩選》裡收錄了中國現代詩作品。特別是《中國現代詩選》裡收錄了胡適、徐志摩、朱自清等 40 名中國現代詩人的一百多篇作品。然而，從台灣詩人的作品也收錄在其中的層面來看，這本詩選具有冷戰時期獨特的中國現代詩選的體制以及規模。然而，隨即這部《中國現代詩選》即被查禁。

此外，當時武俠小說的翻譯也相當的興盛。《精俠誌》（改編尉遲文的《劍海孤鴻》）開始於報紙上連載以及金光州所翻譯的《飛虎》（沈綺雲的《天闕碑》）等台灣武俠小說們一直到七〇年代初期都在韓國中央與地方的日刊雜誌上連載並獲得相當大的人氣⁴⁵。此外，隨著臥龍生、司馬翎與諸葛青雲等台灣作家的武俠小說出版，六〇年代在韓國吹起一股武俠小說風。雖然，當時武俠小說也

⁴⁴ 金俊燁，〈中共政權下知識分子的苦難〉，《展望》創刊號（1955 年 9 月），頁 124-127。

⁴⁵ 相關書目請參考全炯俊，〈武俠小說的文化意義〉（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3 年），頁 56-57。

受到民間審查機構——「韓國圖書雜誌倫理委員會」的強烈警告與制裁⁴⁶，但是大眾讀者的反應卻越加熱烈，到了七〇年代武俠電影的盛行，武俠小說的熱潮更是達到了高峰。也許六〇年代韓國所流行的台灣武俠小說盛況可以與現今台灣社會的「韓流」相比擬。然而，六〇年代台灣武俠小說的流行與當時韓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喜好息息相關。即，新興中產階級的不安與焦躁心理透過武俠小說的內容得到了滿足也得以從現實世界中短暫逃離⁴⁷。另外，對於低收入的讀者來說，武俠小說的閱讀也與他們對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欲望相關⁴⁸。即，六〇年代韓國中產階級或是低收入的讀者等對於台灣新派武俠小說的熱愛其實也反映了他們想從韓國獨裁經濟政策下的壓迫中逃離⁴⁹。此外，台灣作家的武俠小說的傳入也成為韓國作家在創作武俠小說時的養分。從七〇年代後期開始一直到九〇年代，韓國大眾文學的主流——武俠小說其實是以中國武俠小說，特別是台灣的武俠小說為起源，透過改編、模仿台灣武俠小說後再創造新的題材的武俠小說。韓國武俠電影的發展也與上述的武俠小說的發展過程一樣。

然而，韓國對於台灣文學的介紹並不只局限於武俠小說。隨著 APACL 與台灣之間的文化交流越來越活躍，台灣的戰後文學也開始傳入韓國。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韓國對台灣文學的涉獵越來越多，韓國逐漸將中國文學分為中共文學與台灣文學，並逐漸將「台灣文學」的地位特殊化。即，韓國普遍認為台灣文學繼承了中國文學的正統性，隨著對台灣特殊性的關注，韓國也積極地將台灣放入中國（史）的一部分⁵⁰。不僅如此，也積極地將台灣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脈絡裡的中心位置。於是，「台灣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框架就建立出來了。台灣開始代表所謂的「中國」，而台灣文學則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文學、繼承了中國文學的正統性，當時張道藩提出的「三民主義文藝論」與高明提倡

⁴⁶ 韓國圖書倫理委員會，《決定》第 1 號（1971 年 7 月），頁 422-423。

⁴⁷ 金炫，〈為何讀武俠小說呢？虛無主義的負面展示〉，《世代》7 卷 10 號（1969 年 10 月），頁 239。

⁴⁸ 同註 45，頁 105-106。

⁴⁹ 金東植，〈韓國武俠小說研究的新篇章〉（書評），《文化與社會》第 64 號（2003 年 11 月），頁 1854-1858。

⁵⁰ 張基瑾，〈從黃河分流而來的兩個潮流——台灣文學的現代化過程〉，《世代》第 5 號（1963 年 10 月），頁 238。

的「新民主主義」成為「台灣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理論根據介紹到韓國⁵¹。此外，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以台灣文學為重心的《中國文學史》翻譯、出版⁵²。然而，到了六〇年代更是在報紙上以台灣文學特輯——〈台灣海峽的浪濤：今日的台灣文學〉為標題開始連載台灣文學作品⁵³。隨著台灣文學的翻譯與出版，韓國更加關注台灣文學的獨特性。特別是邀請台灣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謝冰瑩、琦君訪韓後，台灣女性文學受到更多的關注。1965年韓國暢銷書《中國女流文學20人集》（1965）的出版充分地反映台灣女性文學在韓國的熱潮⁵⁴。從這本書裡只收錄台灣女性作家的作品來看，我們可以知道韓國不再視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裡的一部分，而是清楚地認知到台灣文學自身的獨特性。此外，權熙哲也介紹了台灣的心理小說⁵⁵。這個時期，雖然韓國仍然將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放在一起談論，但是以台灣文學為重心來接觸中國文學的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極有意義的變化。雖然，對台灣文學的關心並沒有更多持續性的擴展。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對中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之中，所謂的林語堂熱潮也是不容忽視的。815光復以後，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1954）翻譯、出版。爾後，《林語堂全集》（全五卷，1968）的出版、同年林語堂的訪韓都讓韓國的林語堂熱潮達到高峰。林語堂之所以在韓國可以獲得廣大的關注，其原因在於林語堂對共產主義一貫的批評態度，特別是他所持的自由主義信念正好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此外，《生活的藝術》是一本與幸福、自由、快樂等概念相關的書籍，也具有對比、強調出共產主義國家與北韓缺乏幸福、自由、快樂等形象的作用。此外，這樣對幸福、自由、快樂的強調也呼應韓國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所想像的生活⁵⁶。

⁵¹ 車相轅，〈自由中國文學的動向（上、下）〉，《朝鮮日報》，1956年4月30日、5月3日，頁4。

⁵² 車相轅，《中國文學史》（首爾：東國文化社，1958年）。

⁵³ 《中都日報》企劃的「自由中國短篇名作接力賽」（1960年7月—1965年10月）具有代表性。

⁵⁴ 謝冰瑩、潘人木、林海音、吳崇蘭、王琰如、王黛影、艾雯、孟瑤、張雪茵、張秀亞、張漱菡、姚葳、喬曉芙、童真、琦君、劉枋、劉成恩、鍾梅音、嚴友梅、叢靜文等台灣女性作家的作品。

⁵⁵ 權熙哲，〈血跡斑斑的憤怒語言——台灣文壇的窺見〉，《世代》第5號（1963年10月），頁232-233。

⁵⁶ Kueon Bo Deu Lai，〈林語堂，「東洋」與「智慧」的政治性〉，《韓國學論集》第51期（2013年6月），頁99-135。

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對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是持續地進行的。但是在所謂「中國文學」的名稱之下，其實只涵蓋了中國前近代古典文學、台灣的武俠小說以及部分的台灣戰後文學。其中，有許多的翻譯書籍都是在中共與台灣被查禁的書籍。如此來看，在韓國的中國文學翻譯內容是相當畸形化的。也就是說，在韓國所翻譯的中國文學其實是屬於中國文學邊緣部分的中國近現代古典文學。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中國文學翻譯上的畸形化，其中的原因相當複雜。雖然，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當時的冷戰體制，但其實在這樣的框架下也有其他韓國內部制度上的問題。首先是查禁制度的問題。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不允許共產國家的出版物輸入。雖然，也有透過暗渡陳倉的方式將共產國家的書籍帶入韓國國內，但因為行政系統的持續性監控，故依舊難以在社會上廣泛流通。再加上，一直到 419 革命之前，外國文學作品被視為奢侈品，故難以公開地引進相關書籍。爾後，雖然因為對中共採取門戶開放的態度，學術相關的翻譯、出版事業得以進行，但是文學方面仍然屬於敏感的部分。然而，在對中共採取門戶開放的原則下，以魯迅為首的一部分中國近現代作家的作品卻開始得以被收錄於各種全（選）集之中。總地來說，因為查禁制度的種種限制，中國近現代文學難以進入韓國社會，故造成韓國在中國文學翻譯、介紹事業上的畸形化。

第二，韓國學界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的制度結構並不完善。光復以後，各外國文學得以在各大學設立系所、獲得專業性認證的核心原因在於有專門的學術制度與機構作為後盾。1945 年國立首爾大學開設了中文系後，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即 1955 年韓國外國語大學、成均館大學等兩所大學才又設立中文系。之後，隨著冷戰體制的形成，韓國國內大學院校要到 1972 年才開始逐步設立中文系。此時，以高麗大學為首等三十幾所的大學院校才開始逐步設立中文系。關於中文學會的設立也是一樣的情況。韓國最具代表性的「韓國中文學會」要到 1977 年才創立。相較於 1955 年英文學會、1959 年法文學會與德文學會等早已成立的情況，中文學會的成立時間相當地晚。因此，早期中國文學在韓國的介紹與出版大多都由媒體傳播業所主導。但是，五〇到六〇年代的媒體資本家在嚴格的審查制度底下，不僅會被審查當局檢視。為了確保出版物可以順利出版，出版業者也在自我保護的心態下也會自我檢視、刪除出版物的內容。此外，

出版社考量到收益問題後，大多會以商業主義為主要策略，進而選擇出版具有大眾性、商業性的文學作品。

在韓國並非完全沒有與中國相關的團體（學會）。光復之後，標榜增進韓中關係與文化交流的團體相繼成立。諸如，韓中協會（1945年11月11日創立）、韓國學會（創立日期不明）、韓中文化協會（1946年11月15日）等。這些團體的成立原因主要在於認知到處於國共內戰中的中國形勢變化對於光復後的韓國的未來走向有很大的影響。故曾經在中國活動過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紛紛計劃成立這些與中國相關的團體。如前面所述的，在韓戰以後，韓中文化協會在韓國與台灣的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五〇到六〇年代韓國對於外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都受到冷戰查禁制度的規範。不只是共產國家的文學作品，所有外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都受到冷戰查禁制度的規範，其中的差異在於查禁的嚴格度各有不同。此外，大學院校的系所成立制度、相關專門學會的成立與否以及學術期刊的發行與否、研究所以上的學術研究成果、媒體傳播業（報紙、雜誌、出版社）的關心度與編輯的方式等都會影響外國文學在韓國的翻譯樣貌。但，就像是這篇論文所強調的一般，比起其他外國文學，中國文學在韓國的翻譯與介紹的情況是相當畸形化的。然而，這種畸形化的中國文學翻譯又不能完全地說明韓國的中文文學翻譯的實像。因為，魯迅在韓國的翻譯與介紹又是另一種獨特現象。1988年解禁之前，韓國在介紹中國文學的過程裡將魯迅的作品排除在外，卻又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學的先驅者。也就是說，強制將魯迅作品排除在中國文學之外的同時，反而喚起魯迅文學作品的價值與其文學的象徵性。在冷戰體制下，魯迅被視為進步主義的作家而其作品則象徵中共的革命（文學）。同時，魯迅也被視為反封建的啟蒙主義者、反共主義者⁵⁷。不論韓國是在怎樣的脈絡下介紹魯迅的，又或者兩個中國各自如何定義、歸類魯迅及其作品，魯迅的思想與文學都被用來作為冷戰反共的後盾。七〇年代，隨著韓國越來越重視對中共的認識與介紹，魯迅（文學）開始被活用於瓦解冷戰對立思維的部

⁵⁷ 冷戰時期，在韓國有關魯迅的介紹與其相關意義的研究，請參考崔珍豪的研究。崔珍豪，〈冷戰時期中國的理解與韓國的魯迅介紹研究〉，《韓國學研究》第39號（2015年11月），頁277-311。

分⁵⁸，但這樣的魯迅思想的活用仍只局限於少數具有進步主義思維的知識分子。普遍來說，魯迅仍被視為共產主義文學家⁵⁹。故考量到在冷戰時期被定位為共產主義作家的魯迅及其作品在韓國的翻譯、介紹情況，我們可以知道魯迅的思想與作品在韓國對中國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的脈絡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所謂「台灣（接受）／中共（排除）」的二元框架並不足以說明魯迅及其作品在韓國的翻譯、介紹的現象。

⁵⁸ 鄭鍾賢，〈魯迅的肖像——1960-70 年代冷戰文化的中國想像位置〉，《SAI》第 14 期（2013 年 5 月），頁 54。

⁵⁹ 當台灣開放魯迅、老舍等左派作家的作品的消息傳入韓國，韓國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衝擊。並以台灣的例子要求韓國應該更早開放越北作家的作品。同時也展現出韓國想要比台灣更早開放共產主義作品的微妙競爭心理。透過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韓國知識分子與文壇仍然認為魯迅的思想與文學代表中共政權、屬於共產主義文學。鮮于輝，〈納北或是越北文人們的問題〉，《根深的大樹》2 卷 5 號，（1977 年 5 月），頁 68-71。

參考書目

一、專書與專書論文、評論

今川瑛一著，李鴻培譯，《東南亞現代史與世界列強的資本主義擴張（下篇）》（首爾：異彩，2001年）。

尹永春譯述，《蔣介石傳記》（首爾：翰林社，1971年）。

尹汝一，《東亞論：1990-2000年代韓國思想界的一面》，（首爾：Dolbegaе，2016年）。

白永瑞，《看待台灣的視角》（首爾：創批，2012年）。

全炯俊，《武俠小說意義》（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3年）。

池榮在編譯，《中國詩歌選》（首爾：乙酉文化社，1973年）。

吳炳憲，《毛澤東思想》（首爾：白松文化，1975年）。

宋志英譯述，《中國的命運》（首爾：首爾時代出版局，1946年）。

孔子、孟子著，車柱環譯，《東洋的智慧》（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年）。

車相轅，《中國文學史》（首爾：東國文化社，1958年）。

金元洲導演，《命中注定的女人》（首爾：聲寶電影公司，1957年）。

金東植，〈韓國武俠小說研究的新篇章〉（書評），《文化與社會》（2003年幾月），頁1854-1858。

金俊燁編，《中共圈的將來》（首爾：汎文社，1967年）。

金相浹，《毛澤東思想》（首爾：知文閣，1964年）。

瞿佑、劉鸚著，李慶善、金時俊譯，《剪燈新話·老殘遊記》（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年）。

柳根周編譯，《蔣介石秘錄》全五卷（首爾：育文社，1976年）。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台北：中央文物，1956年）。（韓譯本為中國學會譯，《中國裡的蘇聯：暴露中共奪取大陸的真相》（首爾：隆學社，1958年））。

謝冰瑩著，金光洲譯，《女兵自傳·紅豆·離婚》（首爾：乙酉文化社，1964年）。

張世真，《悲傷的亞洲：韓國知識分子們的亞洲紀行（1945-1966）》（首爾：青史，2012年）。

新舊文化出版社編輯群，《世界戰後文學選集》（10卷）（首爾：新舊文化出版社，1959-1962年）。

民眾書館編輯群，《現代世界文學全集》（12卷）（首爾：民眾書館，1969年）。

中央日報社編輯，《中國現代文學全集》全20卷（首爾：中央日報社，1989年）。

全炯俊，《武俠小說的文化意義》（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3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文明基，〈韓國的台灣史研究：1945-2012〉，《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7期（2013年3月），頁237-271。

李奉範，〈1950年代翻譯場域的生成與文學翻譯——國家權力、資本、文化構造上的相關性〉，《大東文化研究》第79號（2012年9月），頁431-510。

金俊燁，〈中共政權下知識分子的苦難〉，《展望》創刊號（1955年9月），頁124-127。

崔珍豪，〈冷戰時期中國的理解與韓國的魯迅介紹研究〉，《韓國學研究》第39號（2015年12月），頁277-311。

張基瑾，〈從黃河分流而來的兩個潮流——台灣文學的現代化過程〉，《世代》第5號（1963年10月），頁236-245。

鄭文祥，〈「中共」與「中國」之間——由1950-1970年代大眾媒體的對中論述，了解韓國人的中國觀〉，《東北亞歷史論叢》第33號（2011年9月），頁57-90。

鄭文祥，〈冷戰時期韓國人的台灣觀——以日刊雜誌的台灣相關報導為例〉，《中國現代史研究》第58期（2013年6月），頁87-103。

鄭鍾賢，〈魯迅的肖像——1960-70 年代冷戰文化的中國想像位置〉，《SAI》第 14 期（2013 年 5 月），頁 51-103。

韓國圖書倫理委員會，《決定》第 1 號（1971 年 7 月），頁 422-423。

鮮于輝，〈納北或是越北文人們的問題〉，《根深的大樹》2 卷 5 號（1977 年 5 月），頁 68-71。

權熙哲，〈血跡斑斑的憤怒語言——台灣文壇的窺見〉，《世代》第 5 號（1963 年 10 月），頁 232-233。

金炫，〈為何讀武俠小說呢？虛無主義的負面展示〉，《世代》7 卷 10 號（1969 年 10 月），頁 230-241。

Kueon Bo Deu Lai，〈林語堂，「東洋」與「智慧」的政治性〉，《韓國學論集》第 51 期（2013 年 6 月），頁 99-135。

不著撰者，〈敵！中共的實情是？〉，《清晨》4 卷 10 號（1959 年 10 月），頁 133-150。

（二）學位論文

王康寧，〈韓國對於張愛玲文學的介紹與翻譯內容〉（首爾：高麗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

崔珍豪，〈韓國的魯迅介紹與現代中國的想像〉（首爾：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2016 年）。

三、報刊文章

不著撰者，〈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活躍介紹〉，《韓民族日報》，1991 年 5 月 3 日，頁 9。

不著撰者，〈台灣抗議韓國的「中國」稱呼〉，《東亞日報》，1988 年 7 月 17 日，頁 6。

不著撰者，〈自由中國的三位學者訪韓與文化交流〉，《京鄉新聞》，1955 年 5 月 15 日，頁 1。

不著撰者，〈銳不可擋的中蘇相關書籍〉，《京鄉新聞》，1988年10月29日，頁11。

不著撰者，〈1955年的劇界〉，《東亞日報》，1955年12月29日，頁4。

不著撰者，〈劇變中的中國〉，《現代公論》，1954年12月，頁125-183。

不著撰者，〈中共的現實〉，《新太陽》74號，1958年11月，頁184-189。

不著撰者，〈中共的暴政〉，《東亞日報》，1959年5月21日-6月12日，頁2。

田淑禧，〈短評：命中注定的女人〉，《京鄉新聞》，1957年7月17日，頁4。

安炳煜，〈我所讀的新書：金相浹的《毛澤東思想》〉，《京鄉日報》，1964年5月25日，頁5。

車相轅，〈自由中國文學的動向（上、下）〉，《朝鮮日報》，1956年4月30日、5月3日，頁4。

金一平，〈蔣介石與毛澤東〉，《新太陽》，1958年11月，頁65。

金光州，〈爐邊隨筆：「新」的〉，《東亞日報》，1947年1月7日，頁4。

俞鎮午，〈歷歷在目的歷史教訓〉，《東亞日報》，1958年10月26日，頁12。

